

一字一汗滴 十年心血盡成書： 談卓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成書歷程及其他

彭家發*

書名：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

作者：卓南生

出版日期：1998年4月

出版社：正中書局

壹、前言

在中國新聞史研究圈子裡，很少人不知道日本京都龍谷大學的卓南生教授。理由很簡單，他是華裔新加坡人，在日本寫中國新聞史專題，而相繼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在台灣、大陸與日本的中國新聞史學術研討會和學術期刊上，發表過一系列令人十分佩服的論文。

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的求真精神和鏗而不捨的毅力。他用了十年的時間去寫他的博士論文，除了主軸論述外，主要是查證《香港中外新報》的最可能創刊日期，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四月間；而其前身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則係創刊於1857年（咸豐七年）11月3日。爲了證明他的推斷，推翻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1927，上海商務）裡的說法，他誓要翻查更多報紙原件。爲了這些報紙原件，他走遍了五湖四海，「上窮碧落下黃泉」。誠如他在序中所說：「……回想自己走過的中

* 彭家發爲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國新聞史研究的道路，路程是曲折與孤獨的。……筆者走上了一條略異於一般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道路。在缺乏同行和知音的背景下，筆者在起步研究時只好盡可能地向日本新聞史學界尋求借鏡，並從中學習其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論。……我開始到處打聽早期流入日本的漢文報刊的下落。幾家大學的圖書館不用說，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附近與神保町的舊書店都是我常涉足之地。……如此耕耘而無收穫的日子和新聞史料調查與研究的滋味，或許只有真正曾身歷其境的同行才能體會和知曉。」自後，他又跑遍港台兩地圖書館和新舊書坊，便中則遍訪學者專家；最後則是浸身在倫敦的劍橋大學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的東方圖書研究室之中。

貳、嘔心瀝血之作

不過，這位「長期寓居東瀛，在中國報史領域踽踽獨行」的作者，血汗沒有白費；最後，他把十餘年的研究心得、文獻和證據，綜成《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鉅著。誠如本書小標題所指出，研究所涵蓋的年份，係始自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創刊，以迄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循環日報》在香港出版為止。在此近一甲子的華人報業發展中，尤著重在《香港船頭貨價紙》（後易名《香港中外新報》）、《中外新聞七日報》（即後之《香港華字日報》）、《中外新聞七日報》（即後之《香港華字報》）以及《循環日報》——這三家十九世紀香港最早發行的三大中文新報，以反映當時我人辦報的三個發展性階段。

作者的研究無疑點滴成篇，但在本書之中，各篇章皆按主要報刊創刊年份，依序排序，蔚成一頗為完整體系和結構。故本書係以緒論作為導讀，簡略地點出中國「邸報」（京報）這類「古代報紙」源流，作為「滑入」近代「新報」之「時光隧道」。這樣的一種跨時空大動作，誠如為作者作序的平井隆太郎教授所說，作者的意圖是：把歐美人士，以東南亞及中國沿海港口的據點，所定期出版的華文資訊傳媒——亦即所謂「近代型中文報紙」，統籌於歐美近代「報紙」範疇內，作一統合性研究。這一鉅觀式的整合，便賦予華文報業的世界觀，從而由一個建制性架構，得窺華文報業階段性發展，可謂用心良苦。

參、一點小補充和解釋

(一)在本書中，作者提及「邸報」為中國古代報紙的統稱，但解釋略嫌簡略，於此稍作補充。其實，根據宋朝徐天麟所撰《西漢會要》，「邸」這種「機構」實起源於近一千八百年前的西漢。其時，定都陝西長安的劉邦，實行分封的郡國制。各個郡國便在首都設立類似現在所謂聯絡辦事處的「邸」，以便轉遞地方官吏的奏章給中央，同時做為郡國官員到京辦事的落腳處。但是，有邸，就不一定有《邸報》，起碼證據非常薄弱（連名稱尚未見於史書，可能祇是個動名詞（gerund）——邸之報導）。

及至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元851年），散文作家孫焦曾寫了名為〈讀開元雜報〉一文（收錄於他所發的《經緯集·卷三》），把幾十件唐開元年間（西元713-741年），摘自於《時政記》和《起居住》而收錄於的《開元錄》的抄件，命名為《開元雜報》。不過，這些抄件祇是「逐月條事，不立首（標題）末（結語）」的朝廷動態消息而已，可以將「雜報」作這樣的詮釋：瑣瑣碎碎的報導（紀事），而非報章的「報」。

再來就是宋人尤袤曾撰有《全唐詩話》一書，其中提到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780年），有《邸報》上有韓翃已被委任為部郎中消息。由於在這段記述正式（首次）確確實實地提到《邸報》之名（名詞），故有研究者認為，此即《邸報》證據是也（唐亦建都於陝西長安）。然而亦有研究者提出疑義，認為《邸報》一詞，祇在《全唐詩話》出現過一次，是為孤例引證（孤證）在學術上有瑕疵。而且，尤袤為宋人，其時《邸報》一詞已經流行，他寫唐代軼事，用了當時流行語彙不足為奇。另外，宋以後，已有民辦「小報」和民間報房報紙，這些報紙名稱和型式，也可能混淆不清的；故此，尤袤所言之《邸報》，是否即吾人心目中所定義的「報紙」，實在須要再作研究。

不過，大陸人民大學新聞系中國新聞史學權威方漢奇教授，曾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找到一份盜自敦煌的唐僖宗光啓三年（西元887年）的一份《進奏院狀》。經他考證這份出現於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刊物，就是《邸報》無疑了。換言之，《邸報》出現於晚唐時代，已信而有徵了。

(二)將"Chinese"譯作「察世俗」確是神來之筆，可見前人譯作之斟酌和功力。(三)《孖刺（西）報》（The Daily Press）主筆Y. J. Mvrrrow，一向譯為孖刺，但考之於Mvrrrow一音，其實不甚貼切，本人仍有以下懷疑：

早期香港英文報紙，的確慣以該報出版人、主編（或主筆）之名為該報中文譯稱（暱稱！）。所以，"The Chinese Mail"中文就叫《德臣（西）報》，因為它的出版人為德臣（Andrew Dixon）。但若從一個較俏皮角度觀照，則孖刺一名，可能另有意指。因為《孖刺報》是於1857年（清咸豐七年）創刊的，時值香港割讓與英人不過十來年，其間中英衝突屢見（如亞羅船事件），即《孖刺報》創刊當年，英、法聯軍即攻陷廣州。粵人民族意識高昂，而當時為英文報紙工作的華人，相信更是身在江湖心在漢；而由於孖刺（粵音讀若"MALA"）兩字音近粵俗語「麻甩」（粵音「甩」音近"NUT"，ㄇㄨㄞˋ，非音"shuai"，ㄕㄨㄞˋ）。所謂「麻甩」者，義近「兔崽子」，也再由於在譯音上，近此俏皮之相關語，故而更樂於稱為《孖刺報》（隱謂《麻甩報》，冀在談笑中，一洩國弱受外人欺負之憤，此係十分合乎粵民「寧斷不屈」的民俗性的。是耶？非耶？是偶合耶？姑誌記之以存疑。㊦談一下「苦力」一詞。苦力原係南印度坦米爾語（Tamil, Kuli），英人在上海營商引進此語，而成了coolie/cooly，即華語之「苦力」。此詞由粵人說起來，無論音譯英文或上海話都成了「咕喱」。所以早期粵人說「賣豬仔」，就是被騙賣出洋做苦工（力）之意，正是一頁華人血淚史。

肆、一些小瑕疵

任何一本名著、鉅著可能都會有些小瑕疵，本書亦未能免俗。俗謂史有求真、求善，甚願以一種野人獻曝心態，指出一、二有待商榷之處，小瑕固不足以掩大瑜也。分述如下：

㊦"Friend of China"，是《華友西報》，祇是誤稱為《中國之友》。㊦Charles Batten Hillen，港官方譯為「禧利」（香港中環即有「禧利街」）。港督Samuel George Barham，港官方譯為般含（香港中上環有般含道）。"Chinese Secretar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港官方譯為民華政務司。港督John Bowring，港官方譯為寶靈（香港中上環有寶靈道）。㊦既然全書係用正體漢字印出，則蕭銳德（Shontrede，頁139）之蕭，宜用正字而非簡體字「肖」。

伍、小結及其他

從論著嚴謹，據論充足，原文影印製版多得令人佩服等等條件去衡量本書，就祇有一個結論，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國新聞史重要著作。它不僅詳盡地介紹了十九世

紀時重要華文報刊，例如，《察世俗》、《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各國消息》、《遐邇貫珍》、《六合叢談》、《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聞》、《中外新聞七日報》、《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等等，最重要的是，卓教授的資料是用腳跑出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原版報刊而得到的，故都翔實可信。

所謂無巧不成書，1969年底，武漢大學出版社將該校新聞學院李敬一教授大作，《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付梓出版，對此時期的民族傳播內容、方法和形式多有闡述。1997年10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孫旭培所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印行，鼓吹傳播研究本土化，兩書內容是互補而又相得益彰的。面對對岸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成就，台灣就似乎冷淡了些。所幸，王洪鈞老師等人已經在牽頭了，過些時日，該不讓對岸專美。